

The Publisher Diaries
出版人札记



出版人札记

赵光辉·著

出版人札记

赵光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版人札记/赵光辉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610-6659-1

I. ①出… II. ①赵… III. ①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23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3370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50mm×230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郭胜鳌
封面设计: 邹本忠 韩 实
封面绘画: 本 忠
责任校对: 李 佳

书 号: ISBN 978-7-5610-6659-1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序

顾奎相

辛卯岁尾的一天，赵光辉同志来我家，寒暄几句后，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稿，名曰《出版人札记》（以下简称《札记》），要我为其写序。我接过书稿，粗略看了目录，便欣然答应他的要求。

可以说，这是我毫无推迟而为其作序之书，也是我从头至尾，饶有兴趣读完全部书稿为其作序之书。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说是两点四个字：一曰“补课”，二曰“感谢”。

我是1987年受冯玉忠校长之托，协助他分管辽宁大学出版工作的，直到2000年初，我从副校长位置退下来，前后凡13年矣！

1988年辽大出版社率先在中国出版界实行承包改革，我代表学校同社长刘万泉签订了承包合同，明文规定：“出版社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承包者即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有权聘任副社长、副总编辑，报学校备案；对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和劳动人事管理有自主决定权。学校应当按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维护承包者的合法权益，尊重承包者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于出版社是独立自主经营体制，我所分管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协调和监督承包合同诸项条款的落实；二是认真审查出版选题目录和选题方向；三是参与出版社一些重要活动，或帮助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或应邀出席迎来送往等

事宜。至于对出版社编辑们的工作态势，乃至他们的喜怒哀乐，辛苦遭逢知之甚少。我一向认为，一所高校兴衰荣辱的关键是教师，同样，一个出版社经营成败的关键是编辑。编辑为出版社的主体，没有多位乃至一批在业务上刀马娴熟，能征惯战的“大编辑”，是支撑不起出版“大厦”的。正因为当年辽大出版社有多位“大编辑”在承包合同相关政策的激励下，风风火火，废寝忘食，忘我奉献，才一度创造了出版社昔日的辉煌。

当时有一组数据经常出现在报端或各类文件中：“辽大出版社从1988年到1995年的七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2449种，平均每年349种，实现利润1365万元，平均年利润195万元，上缴国家各种利税420万元，平均每年60万元；上缴学校利润449万元，平均每年64万元，建起一座50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出版社被评为当时全东北大学出版社中唯一一家‘良好出版社’”。由于辽大出版社跨越式发展，一度名列全国高校出版社的前茅。

上面所列的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却充满着编辑们构筑这些数字的精彩故事。而《札记》从一个侧面生动真实地揭示了一些故事的经过和原委。先不说具体内容，从书的目录就能一目了然。诸如：“五月惊魂”、“白山黑水大浪淘沙”、“独闯京西宾馆”、“雨夜等得作者归”。细查内文，作者所用“惊魂”、“独闯”、“雨夜”、“大浪淘沙”等字样，不是耸人听闻，亦不是妄猎读者眼球，而是作者对组织某一书稿过程中的亲力亲为的准确描摹。为节省文字，又尽量覆盖全貌，仅举《中国税制》等三本财税方面的图书说明之。

那是1990年中后期，光辉同志时任经济编辑室主任，欲把选题拓展至财税方面。由于刚涉足这一领域，人生地不熟，先经他爱人介绍，到省税务局见到姜处长，又经姜处长介绍到

了国家税务总局。此时，适逢税制改革的峰值期，国家税务总局正出版许多关于税制改革方面的教材，故北京各大出版社，特别是北京财经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及税务出版社，无不将国家税务总局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紧盯不放，不容他人染指。因此，光辉同志刚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同志接触时，“屡遭白眼”，“敷衍推脱”。但光辉同志没有退却，每次去北京都满怀“热情”去拜访，“不谈书稿，只谈感情。一年没结果，就等到第二年，第二年没结果，就等到第三年，循环往复，从不间断”。可能是他惊人的执着，感动了上帝，国家税务总局可能出于考验，要辽大出版社给出版一本印数不多，又时间很紧的图书。辽大出版社高度重视，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时间将书如期出版。这次成功的“合作”，赢得国家税务总局的认知和认可。时隔不久，国家税务总局主动约光辉同志去北京谈出版一套《全国税务系统公务员培训教材》凡5本，全国发行，印量颇大。故多家出版社蜂拥而上拼命争取这套选题。这5部选题，花落谁家，要等有关领导最后审定。光辉同志得知这一信息后，为使有关领导更多了解辽大出版社的情况和实力，立马登门拜访。不巧，去的当天该领导到北京廊坊讲课要半夜才能回来。时值初秋，颇感凉意，到晚上八时许，又下起倾盆大雨，他只好从马路上跑到楼道里“蹲守”，深夜11点钟，“领导”终于回来了。见光辉在雨中等他，非常感动，热情地把他请到家里，倒上一杯热茶。光辉同志说明来意后，那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不来，这套书肯定给东财出版社了，因为我们和东财出版社是长期合作单位。如果不是看到你在雨中等我，我也不会答应和你们出版社合作，你的精神感动了我，我想，我们一定能合作得很好。”结果给辽大出版社三本发行量最大的书稿，即《中国工商税制》、《基础会计》和

《成本会计》。这三本书自1994年首版之后，连续再版，发行量可观。至此，辽大出版社在税务系统占有一席之地，也给出版社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其实，光辉同志组三本财经书稿的戏剧性经过，这在“系统图书”出版中，仅是一个序幕，还有签订合同，审读、修改书稿，付梓印刷，直至图书发行；乃至发货、催款、结算等。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落实起来都颇伤脑筋和大费周折。例如，在他编辑《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时，著名哲学家方克立嘱咐光辉同志说：“这套丛书作者是以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书中的观点和文字不能修改，你不要动一个字。”对此，光辉同志的态度和做法是：“至于学术内容和观点尊重作者研究方法，但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明显偏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精神，而且文字量很大，对这样的内容我毅然决然地给予删除；对个别晦涩难懂的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他将修改意见和具体内容专门向方先生做了报告，方先生看完修改意见之处后，非但没有异议，反而是赞许有加。还比如，《女性健美和美容》一书，凡15万册，按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印制完成后，在三个月内甲乙双方应结清全部书款，而甲方“鸡蛋里挑骨头”，就是欠钱不给。光辉说：当时“弄得我筋疲力尽，心力交瘁，尽管这样也不灰心，‘厚着脸皮’去催款，不给我就不走，多次往返，但都是空手而归，心里特别难受”，“这种无形压力，压得我经常半夜醒来，盘算着明天怎样与发行公司谈判”。就在这位硬汉一筹莫展之时，他闻知这个单位领导班子正在换届，深谙“官场”的光辉同志，决计向他们的上级党委反映“恶意”欠款的问题。对方得悉光辉的举动后，态度马上软下来，“最后总经理出面和我谈，并一再安慰我

“别生气，一切都好说”，不久书款果然如期划到出版社账上”。

我列举光辉在组稿、编稿、催款过程中的三个镜头，仅是他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笔触，真实的细节，率真的情怀，详细、系统地记录了他二十年编辑生涯的辛苦遭逢。此书虽卷帙不巨，但弥足珍贵。从主观上说，将成为作者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无论何时重读她时，都不会有乏味之感。从客观上说，作者所记录的所历所为，绝非是个案，应是众多地方出版社（恐怕“人民”、“中华”等高端出版社的编辑不会有上面那些“享受”）从传统迈向市场，尤其在“系统发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竞争。竞争是社会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当年，辽大出版社就是有像光辉同志这样的一批编辑，勇于竞争，善于竞争，乐于竞争，使辽大出版社从无到有，日隆一日，蓬勃向上，为世人瞩目。然而，此时的竞争，还是出版社刚刚进入商品经济大潮中，市场游戏规则还不完备，所以产生的竞争故事有的令人忍俊不禁。但《札记》毫无回避和掩饰，都全景式的记录下来，这为几十年后撰述辽大出版社史乃至中国出版史都是难觅的珍贵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会长留书架上，成为一些读者或研究者爱不忍释之作。

我已逾古稀之年，人老了好追忆往事。《札记》所记，正是我所不了解的部分，算是给我“补课”了，使我将出版社昔日辉煌的因果联系起来了，让我更清楚地知道出版社发展的历程，乃至一些图书组稿、出版、发行的内幕。由此，我“感激”光辉等多位“大编辑”为出版社，为辽大的发展所奉献的智慧、心血、汗水及蒙受的种种不快之事。辽大出版社一度誉满天下，为辽大增光添彩，我作为一位具体分管者，也倍感荣焉！

《札记》从体例上或者内容上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

记述每件事情之后，都附有长短不等的“作者小语”。如“第一次组稿”题后的“小语”为“谈谈怎样组稿”，“京剧艺术与烹饪文化”题后的“小语”为“谈谈编辑的文化视角”，“独闯京西宾馆”题后的“小语”为“浅谈编辑的闯劲”，“雨夜等得作者归”题后的“小语”为“小议编辑的耐受力”等等。从作者所言的深度和广度看，“小语”不小，很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古人修书有个传统，《左传》后有“君子曰”，《史记》后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后有“臣光曰”等。所有这些都是因事立论，有感而发，既寓作者的褒贬，也想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世人。光辉同志的“作者小语”，有意无意地承继了先贤修书的体例遗风，将自己在编辑过程中所碰到的重大事件，在“作者小语”中上升到理性高度，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颇具理论性、现实性乃至指导性。“小语”论议范围触及较宽，几乎涵盖了一位编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学养。诸如：编辑的“政治意识”、“文化视角”、“应知应会”、“职业信仰”及“编辑的闯劲”和“耐受力”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仅撮其要以证之：

第一，首倡会组稿。光辉同志说：“编辑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选题，而实现选题的具体手段就是组稿，只有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稿才能提炼出优质的选题，也是磨练编辑意志的过程。”谈到怎样组稿时，首先强调“只有找到和发现有价值或者有潜在价值的作者，组稿才有动力，才有方向，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拿到一部书稿能否采用，……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意识形态的识鉴。尽管在图书出版中要贯彻‘双百’方针，但是绝不意味着编辑可以不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须以此来决定书稿是留下还是坚决退稿。二是学术价值和文字水准的识鉴。三是‘双效益’的识鉴。”此点光辉同

志特别强调，编辑在组稿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两个效益”发生冲突时，要把图书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此节“小语”的最后，作者清楚列出“组稿的具体步骤是：（1）确定选题；（2）谈稿、约稿；（3）成本核算；（4）签订合同；（5）审稿、编辑加工、定稿；（6）收集反馈信息；（7）宣传推广。”

第二，强调成“杂家”。光辉同志在“小语”中深有感触地说：“所谓‘杂家’就是要精通或者粗通多方面的知识，在多个知识领域里做个明白人。”因为，“编辑的一生中要接触的许多作者都并不囿于你的专业领域，这就需要编辑在和作者谈稿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特别是对相关专业领域的了解，这样作者才会相信你的编辑能力，才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到你的手上。”光辉同志强调编辑做“杂家”，除熟练而扎实的专业技能外，他还强调“面对出版社转企改制的现实，编辑的身份也在改变，由过去的专业‘文字匠’，逐步向出版商转变；由过去的‘事业人’向‘市场人’转变。因此，编辑专业技能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涵盖了出版产业链的全过程。例如，要懂得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要懂得印张如何计算；要懂得版权知识，电子出版的相关信息及纸介图书转化成电子书相关政策和产业信息等。这些基本技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走在专业前沿的编辑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编辑。”

第三，重视文化视角。光辉同志此节“小语”很值得重视。他言简意赅地说：“在编辑工作中，如何运用编辑的文化视角来精炼选题，推陈出新，独具匠心地催化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图书出版，并充分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他还掷地有声地说：“一位成功的编辑不仅仅要关注市场、码洋、利润，不仅仅只是做个出版商”，“而是要看这个编辑出版了多少有文化价值的图书，特别是出版了哪些传世之作，……

而出版的那些‘应景’之作，尽管当初赚了一些钱，但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都会成为‘浮云’，经不起文化意义的考验，所以，编辑要特别注意用文化视角来策划图书选题，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这才是编辑工作的根基。”

前面说了，《札记》中的“小语”触及一位编辑工作的各个元素，作者都有独到的论议，如讲到编辑的“耐受力”，他形象地说：“就像大山深处寻找金矿，在茫茫原野和戈壁上探寻石油一样，其过程充满艰辛、痛苦、失落、寂寞、枯燥、焦虑、压力……只要我们充满韧劲（耐受力），充满不懈追求的动力，……就能到达辉煌的彼岸。”在言及编辑和作者关系时，他说：“出版业中最活跃的生产力是作者和编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是缺一不可的‘鱼水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互为因果关系。”说到这里，我自知写得太冗长了，不便再赘言。

细读各篇“小语”，绝非作者东拼西凑，哗众取宠，而是经过长期的编辑实践，有切肤之感而生成的思想和结论，已升至一定的理性高度。如果将这些“小语”单独合并组成，再加一定链接和润色，将是一本根植于实践的理论性著作。很显然，《札记》主干部分的每一单元，有一篇完整的叙事，紧接是一篇针对性极强的“小语”，而叙事生动、平实、坦诚，而“小语”理性、透彻，语出惊人。观全书叙事和议论好像单摆浮搁，其实是密不可分，珠联璧合，是一部叙事和议论有机结合的上乘之作。我认为，此书对很多初做编辑工作的年轻人是难得的“良师益友”。

光辉同志在“小语”中所阐释的精彩观点，我过去也没听他讲过，读后又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受益匪浅，并感谢他在出版理论上的贡献！

还有，光辉同志进入出版社后，好长一段时间是“双肩

挑”，1993年做社长助理，1995年任出版社副社长，1998年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编，直到2001年。《札记》中没有详讲他的行政工作，在字里行间，略有涉及。如协助出版社领导解决了“海南金洋公司”问题，为出版社挽回了一定经济损失。还担纲起草制定了《第二轮承包期奖励金分配制度》，这项制度出台后，对推动出版社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做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后，对推动选题市场化和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有口皆碑的工作。光辉同志进出版前，曾服务于军队机关和省委机关，熟悉社会，晓得人际，做事果断练达，有解决难题和驾驭全局之才，为刘万泉社长，为辽大出版社做了许多排忧解难之事，在繁杂行政管理的同时，还扎实地做好编辑工作，一度成为公认的“创收大户”之一。显然，《札记》所记并非虚言。

《札记》尾部附录5篇文章，其中两篇记录与冯玉忠校长和刘万泉社长的过从，从中可以看出光辉同志是位性情中人，颇重朋友之情，交往之谊。后两篇，一曰《低碳经济与中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曰《中小型出版社数字化转型中的超前思考》。读后，令人明显感到，光辉同志在编辑队伍中是位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战士！

说实话，我是大病出院后身体还很虚弱，头脑还不太清醒时，胡乱啰嗦上面一大堆话，大有力不从心之感，没有引经据典，只是看了书稿后抒发我的一点感触和感想，名曰序，焉名不副实。

壬辰年元宵节

（本文作者系：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辽宁大学副校长，现任辽宁省文史馆馆员。）

一个出版人的心路历程

序赵光辉《出版人札记》

武 斌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出版界有许多朋友，其中既有资深的前辈出版人，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编辑，更多的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同辈朋友。与出版界的朋友的友好交往与成功合作，是我这许多年来的成长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有的时候是参与他们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组织丛书等工作，也有的时候帮助他们审读一些稿件，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还以作者的身份为他们写稿。正是在出版界各位朋友的帮助、鼓励和支持下，才有了我今天可以自诩的那些所谓“学术成果”和“学术成就”。在我出版的著作中，都包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更容纳着他们真挚的友情。有人说过，“每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的背后，都站着一位默默无闻的编辑；每一位名满天下的作者的身边，都有一群甘愿奉献的编辑。”对此，我深以为然。更多的情况是，我与他们的交往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聊天和交流，在出版社的编辑室里，在咖啡馆里，一杯清茶，一支香烟，漫无边际地畅谈当今的文化走势、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动向、流行的畅销书以及哪位名人作者的情趣逸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也许谈着谈着，某一根神经被触动，忽地涌现出什么灵感也未可知。可以说，与出版界朋友们

的聊天、交流，是我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

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光辉先生，就是我在出版界的好朋友之一，而且是来往比较密、持续时间最长的朋友之一。自从他到出版社工作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比较多的来往，这期间也有几次比较愉快和成功的合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和人的问题，写成了一本书，叫《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集中讨论文化、人格、现代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这本书就是光辉先生安排出版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反映还不错，并且引起国外学术界的注意，比如在科威特就出版了它的阿拉伯译文版本。二十几年过去了，有一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说，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在这些年中得到证实的，有些看法和意见很有前瞻性，建议我修订再版。于是，光辉先生又安排了这本书的再版，同样也有不错的评价。至今我还认为，在我出版过的著作中，《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是思想性和理论性比较强的一本，而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光辉先生都给与了很大的帮助，付出了很多心血。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包括思想上的、知识上的和文化情感上的交流，这种交流使我们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和交集。最近，光辉先生把他在出版社工作二十多年的经历和感受、心得写成一本书，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出版人札记》。我在阅读这本书稿的时候，思绪常常被他的笔迹带回到从前的岁月，带回到我们一起交流、切磋和合作的情境中。作为作者和编辑，也作为在思想和文化上有许多契合的好朋友，可以说，那些岁月我们是一起走过。

光辉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到出版行业的。

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百废待兴，整个社会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气氛，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们的精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振奋，人们的求知渴望也更为迫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启蒙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全民精神迸发的创新时代。被“文革”破坏的文化事业都在恢复，大量国外的新文化、新思潮、新知识被引进来，新闻出版界也显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我们都还记得，那时候的许多出版物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比如四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世界》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新知文库》等等，都领一时之风骚。光辉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走进出版界的，作为一位有文化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在这样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多年过去了，可以说，光辉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在出版事业上默默耕耘，兢兢业业，联系了许多高层次的作者，编辑出版了一批很优秀的学术的和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在出版之时就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有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积累价值，还有的成为了学者们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比如那本很有名的《别无选择》，比如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的《周易与怀特海之间》，比如关于新儒学的研究丛书，比如研究著名表演艺术家唐韵笙的《唐韵笙评传》等等。此外，光辉还出版了一些文化读物类的书籍，比如关于围棋的、菜谱的等等。从面上来看，光辉出版的书籍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内容也比较庞杂，但其中都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对于现代文化的理想最求，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 and 价值理想。

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社会经济生

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风云变幻，出版界也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出现过一些时候的困难阶段。我们都还记得有一阵子出现了读者买书难、书店卖书难、作者出书难的怪圈，而那时候大多数出版社也都经历着“经济效益”的困境，在改革中艰难地起飞。光辉作为在出版第一线工作的出版人，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参与了这一变革的过程。他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参与这个过程的经历和体会。可以说，光辉的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出版界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所以，光辉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出版人”，更强调自己在出版行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对自己角色的认定。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这个定位，但是我更倾向认为，一个好的出版人，更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人、读书人。编辑出版工作不仅仅具有商业的性质，更是文化的事业，更是一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是一位有文化修养和文化内涵的编辑，一位“学者型”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如何，知识水平如何，业务能力如何，直接影响着出版物质量的优劣。所以编辑人员对于多出好书，不出坏书，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这样，对于编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的要求就很高了。有人概括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编辑，需要三种文化创造力，即发现的能力、组合文化的能力、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等。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础。优秀的编辑都是孜孜好学者。他们阅读广泛，了解各种知识，同时在某一个领域内有很好的判断力，能够为自己谋划的选题发掘“最合适的作者”。所以，我认为，光辉在出版界的二十多年中，能够出那么多好书，出那么多既有经济效益又有文化价值的重要

著作，与他的能力有关，更与他的文化内涵有关。他对于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广泛了解，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对于各种流行思潮和流行文化的恰当辨别，都与他的文化修养有直接的关系。而优秀出版社之所以领先于同行，就在于它拥有一流的编辑人、出版人。如果我们的出版社有更多的杰出的出版人和编辑，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好书可看。

出版史上的许多著名出版家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优秀的编辑人、出版人都对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从光辉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他对所从事的出版事业怀着一种深沉的挚爱之情。他爱他的工作和事业，把自己的心血融入到出版事业中，更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理想在自己的事业中一点一滴地实现出来。我总觉得，做任何一种事情，能力、知识、水平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情感，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我们在赵光辉先生对自己从事出版工作经历的叙述中，更感受到了这种奉献与忠诚的浓浓之情。现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版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出版传播文化、普及文化的本质不会变。作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积累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活动，我们永远都离不开它。有出版，才会有今天的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

2012年2月4日

（本文作者系：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沈阳市文史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